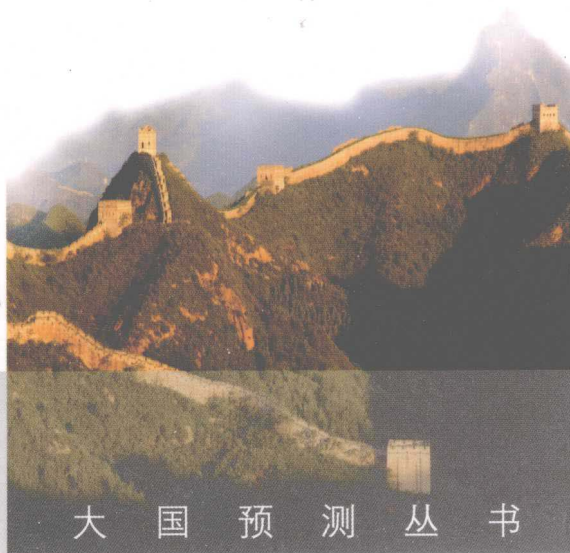


大格局

2020年的亚洲

总主编 冯绍雷 主编 陈东晓



大 国 预 测 丛 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 国 预 测 丛 书

大格局

2020年的亚洲

总主编 冯绍雷 主编 陈东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格局:2020 年的亚洲/陈东晓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5617-7564-6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报告—亚洲 IV. ①D73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211 号

欧盟研究丛书

大格局:2020 年的亚洲

总 主 编 冯绍雷
主 编 陈东晓
策划编辑 周 洁
审读编辑 包广将
责任校对 汤 定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564-6/D·152
定 价 3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冷战后的国际预测研究:观点、特征与问题

代 序

冯绍雷

国际预测是当前国际研究中的一项热门。当前所处国际格局转型期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态变迁和力量消长,自然而然地使得国际预测成为各个层次决策过程中的一项必要前提。而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广泛国际变迁和前所未见的国内体制深刻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崭新问题,又使得国际预测研究本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包括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样一系列罕见的重大历史变化居然是在不期而遇之下发生的,这样的一种现状,不由得使人们对于能否提供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研究表示关切,而同时,又急切地寄希望于这样高质量的智力供应问世。

广义地说,几乎所有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包括全球政治、大国关系、世界经济、国别研究,也包括非传统意义上的气候变化、能源竞争、人口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等各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为国际决策提供预测这样的功能。

狭义地说,国际预测又是一项专门地研究国际社会未来的结构变迁与动态演进的知识门类。它既可以是分门别类地按各个知识领域对于国际发展的未来做出预测,比如,就经济、政治、军事、人口、教育、气候等各个专业领域发展前景的预测报告;可以是像罗马俱乐部的环境发展报告;也可以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的经济报告一类的预测。同时,狭义上的国际预测还可以是综合性地反映若干年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预测报告。比如,近年来连续在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出现的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集体创作的综合国际趋势报告,广泛吸收了各学科专家参与、设定了较长的预测时段、并且采用了较新的预测研究的手段,总的来说体现了国际预

测的较新理念。

另外,许多国际战略研究家、国际问题领域的理论家也都为国际预测提供了很多的范例。这样一类的国际预测既是一种带有个性化思考的个体创作,但同时又是一定条件下的理论流派和国际思潮的具体表现。许多综合性的国际预测报告往往是以这样独立的理论家和战略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作为其工作基础的。

一

国际关系史上,各种严格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预测汗牛充栋。如果我们不做更早的追溯的话,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预测这一门类的实际状况的演进,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及观点加以回顾,有利于对于当前种种国际预测成果及其背景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大体上说,冷战之后的国际预测研究,特别是以个体创作为基础的预测研究,来自于诸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想史与意识形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研究、国际文明形态研究等各个方面的思想成果。由于理论来源和观察视角的不同,因而,在结论和方法上都显现了不同的特点。

对于侧重于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国际预测来说,最为著名的范例就是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当福山预言“历史的终结”时,冷战尚未结束。他是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使用了一个容易记忆、但却是过于简单化的箴言来描述冷战的终结这样异常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实际上,福山所使用的历史概念,并不是一个习惯意义上理解的历史,而是指一种不断演进的大规模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历史,正在转向一种以意识形态建构和基本体制原则为导向的发展进程。福山当年在中国发表演讲时,再三强调他的“历史的终结”的理念是来自于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传统社会主义这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反思。福山提出,人类历史势必将以民主自由为取向。他认为,民主自由的价值标准要比任何神学、世袭专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来得优越,并且,也符合人本身追求自我价值的需求。因而,虽然具体社会演进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各种不同的结构组合和方向调整,但是,民主自由的根本性的价值标

准是用不到再作任何修正。事实上,福山所认为的“历史”指的是,一种贯穿着以何种社会生活组织方式为最佳状态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社会进程;而当某一种意识形态在竞争中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这样的历史就被宣告终结。显然,这并不只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过程的终结。^[1]福山对于未来历史发展的勾画一度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使得人们对于从这一角度对国际发展所作的预测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学术界还由此进而对于福山的思想渊源所在,即亚历山大·科耶夫和列奥·斯特劳思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发现了其间的一脉相承之处。饶有趣味的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弗兰西斯·福山本人曾经对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修正。在美国于2003年发起这场战争的时候,福山还曾经是小布什政权的铁杆支持者和战争的鼓吹者。但差不多3年之后,福山明确地表示,不能够强行地用武力在伊拉克这样的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然而,虽然如此,也不必以此而过度夸大福山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迄今他还是恪守这样的观点: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与自由始终将是公平有效的管理制度的最终保障^[2]。显然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将继续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体系的重构。

其次,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国际预判。

如果说,弗兰西斯·福山是一位乐观主义的国际预测者,那么,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就堪称是一位相对悲观的预言家。根据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上都极度混乱的时代,一切都动荡不已、前途未卜——在这个时代生活,殊非易事!”显然,金融危机的到来至少部分地证实了这位预言家的判断。^[3]沃勒斯坦的预测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第一,他既是超越了观察国际事务的国家本位观点,从整个宏观国际体系的、以经济为主的多种要素出发来思考未来国际发展的长远前景,同时,也提出了周期性霸权观点,认为基于国家为单位的国际霸权将周期性地循环主导国际事务。第二,以周期性效应和世界经济中的利润紧缩这两点的同时存在为理由,沃勒斯坦自从2002年题为“老鹰坠地”的这篇著名文章发表以来,始终强调美国的衰落;然而,对于未来谁将称霸,包括对于被众人看好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则始终保持了谨慎低调的态度,甚至于告诫中国

的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第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沃勒斯坦显然持有法国年鉴学派布卢戴尔式的“事件如尘埃”式的长时段的结构主义历史观点,而在“知识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他又自诩也是属于建构主义这一派别,认为任何关于未来的知识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样一种开放而又谨慎的学术态度使得沃勒斯坦的建言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吸引力。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是许多国际预言家们的理论出发点。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现实主义流派擅长于从地缘政治及力量相互消长的角度来判断形势。而其中又包含了各种派别的区分。比如,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老一代战略家,他们不光精通历史,而且具有很少有人可以与之比拟的丰富决策经验。基辛格于本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了关于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正在发生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判断;并且告诫,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战略谋划,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巨变,可惜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4]基辛格的这一警句对于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权力转移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铺垫。而布热津斯基则出于多年来对于大国关系的潜心研究,每逢国际格局重大转换期间,必有议论。他最近提出:“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0年里,美国仍将会是全球最大和最繁荣的经济体,而中国也将成为世界大国。未来的国际形势有两种可能。如果欧盟能够实现政治领域的统一,那么未来20到30年世界大国的排序应该是美国、欧盟和中国,日本、俄罗斯将位列其后。如果欧盟难以在政治领域实现统一,全球地缘政治等级排序首先将是美国和中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将尾随美、中两国之后,印度或许能够跻身其中。除非出现巨大的逆转,比如美国爆发全面危机,中国出现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或者新的大跃进等动荡情况,我不认为上面提到的格局将会出现令人感到惊讶的变化。”^[5]布热津斯基所提出的以“G2”来描述中美之间关系重要性的概念设计,近来也引起了巨大争论。但是,以我之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概念还是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当代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实质问题之所在,虽然,这还并不一定就是未来国际政治的确定无疑的前景。

同属于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们与决策专家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从学理的角度从事预测。其中在后冷战时期依然有很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应属肯尼思·沃尔兹。在

冷战末年,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一变以往美国领导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立场,强调基于权力以及具有“内部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在自助的国际环境下完全可以为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结盟。当时,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符合美国当时的战略需要,尤其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对外交政策的调整相吻合,也包括中美关系的缓和。虽然,沃尔兹关于两极格局属于稳定系统的论断,被两极世界突然崩溃的现实所否定。但是,在后冷战阶段的最初时期,沃尔兹一反当时多数舆论所认为的后冷战阶段是美国一统天下的观点,有远见地提出,由于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崛起,世界已经出现向多极化的转变;他还曾提出,随着美国将逐步地撤离欧洲,北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的观点。^[6]而现实主义派别当中的超现实主义流派,以富于进攻性的米尔斯海默为代表,则相异于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沃尔兹认为国家会理性地将安全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大可能追求权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则承认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但同时强调权力是维护安全的唯一可靠手段。米尔斯海默当时流传非常广泛的论断之一就是相互之间信息不透明、而战略意图方面却相互以对方为敌的背景下,在东半球崛起的中国将会与控制西半球的美国发生战略竞争。^[7]米尔斯海默的预判在新世纪之初名噪一时之后,很快地又出现了在理论上经过更新的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关于未来国际变迁趋势的争论。

稍后的理论争论发生在一个新的领域,也即围绕着从体制转型对于未来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所发生的前景预判的争论。随着小布什在本世纪初期的两任执政,新保守主义思潮借机得以蔓延。作为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在2008年4月在《New Republican》上发表的一篇长文《历史的轮回》中提出,第一,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接近,“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卡根提出,甚至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甫罗夫也认为:“多年来第一次,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真正的竞争性环境。”第二,卡根认为,在宏大战略问题上,已经不再有一个国际共同体可供召唤和领导,大国之间几乎谈不上什么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相反出现的是猜忌和日益加深的敌意。第三,卡根断言,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

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第四,卡根提出,市场经济能够和独裁统治并存,紧密的贸易关系也无法阻止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全球独裁大国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重新抬头正在削弱自由国际秩序,民主力量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作为新保守派中坚人物的罗伯特·卡根上述言论,是其多时以来的一贯思想的表达,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8]他甚至于把北京奥运会和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在2008年8月8日同一天发生,都称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结成联盟的象征。

而与此相对立的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艾肯伯利则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他的一整套另一种观点。艾肯伯利认为:第一,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终结美国一国独大的单极时代,但是这不意味着必定是以暴力的权力之争或推翻西方制度。第二,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和以往的国际秩序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即现有的有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因为,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 leadership 性质,还由于这一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第三,正是这套秩序导致了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甚而使得前苏联也开始改革,而没有酿成世界大乱。第四,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为此,美国应该为中国和其他“金砖四国”成员“腾出位子”。与罗伯特·卡根相比,约翰·艾肯伯利虽然没有太多强调中俄关系的作用,但是理论逻辑确是非常清晰,也即,如果说,卡根是个主张以实力争胜的悲观主义者,他强调的是,中俄与西方必有一搏,那么,约翰·艾肯伯利并不同意整个世界正在重新划为两半,专制和独裁正在殊死斗争的说法,相反却是乐观地相信现行的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认为在中国(包括俄罗斯)和西方体制之间存在很大合作包容的空间。^[9]

这两位具有相当影响的西方理论家所提出的不同观点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相同的重要命题,即确认“制度”或者“体制”因素在当前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卡根看来,如若国内体制相容,则既定国际关系格局能够维持;如若国内体制相悖,

则一场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而在艾肯伯利看来，国际体制的强大足以容纳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东西方之间能够两下相容。问题在于，这两位理论家似乎都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可能性，即，除了对抗和吸纳这两种可能，新的国际秩序还可以通过新兴国家与既有国际体制之间的既平等又复杂、也非常可能是长时间的互动来形成。

第五种预测的观点是围绕着重大国际竞争所发生在何种领域的不同判断而出现。一般而言，在国际预测中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关注经济，强调政治权力的竞争。但是，前不久去世的塞缪尔·亨廷顿则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发出了“文明的冲突”的论断，从而成为后冷战时期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位战略理论家。亨廷顿认为，与你是靠什么生存的问题相比，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你是谁，也即你归属于何种文明与民族的问题。与前者相比，你是谁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刻骨铭心、因而也更加容易引发冲突的问题。9.11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一段日子里，美国的大小书店最显眼的橱窗里摆满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但是，亨廷顿本人则坚决否认他所发表的观点与9.11恐怖主义袭击有任何的联系。一直到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亨廷顿才大体上承认，当时的形势有点接近于他所理解的“文明的冲突”。事实上，尽管亨廷顿有远见地提出了冷战后已经不存在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而各种文明之间如果不能够具有非常清醒的自我认识以及相互之间很好地形成沟通的话，那么可能发生冲突的警告，但是，亨廷顿过于强调文明间的冲突，而忽略文明间互动、沟通与合作的可能，以及不正确地描述了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将与伊斯兰-儒家文明之间的对抗前景，这些判断都是作为一位著名国际战略理论家所留下的遗憾。

我觉得在本文值得一提的最后一种、但远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国际预测，是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提出的大国兴衰的机理。有人认为，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出版1年之后，半个世纪的冷战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胜利而宣告结束，而保罗·肯尼迪是以警告美国，即为衰落而闻名，因此他成了一名最倒霉的预言家；也有人认为，《大国的兴衰》整部书“只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后起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云），因为全书只是经济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组织体制革新能力等方面

大量素材的汇总。但是,之所以大国的兴衰成为 20 多年来被广为引用的话题,说明保罗·肯尼迪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当今影响时代走向的大国权力转移这一重要问题。事实上,除了《大国的兴衰》所拥有的丰富材料所表达出来的职业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我们只要引用一下作者在 20 多年前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描述,就可以感知这位历史学家的远见与功力。保罗·肯尼迪在书中提到:未来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会增加它的对外贸易,但是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西德或日本,由于中国的广大内需市场,中国不会像海上贸易国家那样依赖贸易。其二,中国有和平诚意,也决心维护自己的独立。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是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北京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其三,虽然中国目前对军费实施严格的控制,但它并不是要使自己在将来成为一个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国家,相反,当你回顾一下中国是怎样重视加强它的科技基础建设,以及它在其科技基础还是如此薄弱之时就在火箭和核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那样惊人的成就时,你就会清楚地看出这种含义。^[10]可以说,保罗·肯尼迪是冷战后最早一个明确言说“中国崛起”的国际预言家,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仅透过中国前景的这一个点就得以充分显示。不久前,保罗·肯尼迪则进一步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世界事务前景把脉。他断言:“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在人口、人均土地面积、原材料、高校和科研机构、劳动力流动性等方面都存在巨大优势。近 10 年来,华盛顿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华尔街内外的贪婪成性以及海外军事过度扩张,都使得这些优势黯然失色。……事情本可以有更好的结局,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可以恢复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荣光。全球结构体系的重心逐渐从西方向亚洲倾斜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他认为“在这一变迁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直觉告诉我,美国在 2009 年将衰落”。^[11]

二

除了上述所介绍的冷战后国际预测领域相关国际专家的个人观点和立场之外,一

个更加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出现了一批相当有份量的集体创作的国际预测作品,例如普林斯顿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普林斯顿报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大趋势——2020 年的世界》(后有新版的《全球趋势 2025 年》)、欧洲改革中心的《2020 年的欧洲》、俄罗斯国防与外交委员会的《2017 年俄罗斯及其周围的世界》(后有新版的《2020 年的俄罗斯及其周围世界》)、以及日本的《内部界限——日本在 21 世纪的目标》和《日本 2030 年前未来技术的发展》等等。这批作品以大制作、大投入、大开放等方式为特点,瞄准了未来 10—15 年的国际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判断。比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大趋势——2020 年的世界》中提出:全球化大体上不可逆转,很可能变得不太西方化;世界经济规模会大大扩展;现有强国的人口老龄化;亚洲崛起,并有可能出现新的中量级经济;“地下”的能源资源供应量足以满足全球需求;非政府行为者影响力上升;政治化的伊斯兰将继续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大国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继续保持其单一的最强国地位,但是,作为主要的新崛起中的全球力量,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将会改变地缘政治的图景,其潜在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将类似于在上两个世纪中,即在 19 世纪德国统一以及 20 世纪初出现的强大的美国那样的变化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12]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重要国际预测作品、包括俄罗斯的预测作品不少是在几百万美元以上投入的推动下制作而成的,因此也有条件集中最为优秀的各领域专家,并且在制作方式上也采取了相当开放的态度,不光是向国外派出了重量级的专家代表团(往往还伴有意见不同的理论界权威人士同行),其中好几个项目都是在全球各地举行了几十场,甚至上百场讨论会、意见听取会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巨制。这是新时期国际预测研究领域一个相当突出并发人深省的现象。

在这样的大制作背景之下,预测研究的手段与方法自然是有可能获得比较明显的改进。事实上,无论任何一个类别的国际问题的预测,不可能不是一种多种学科知识、多种思潮观点的综合。离开了多学科以及多种思潮汇合这样的背景,恐怕是难以对复杂的国际现象做出任何前瞻性判断的。以上述的几项重大研究为例,实际上,所吸收的学科涉及人口统计、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与技术、全球经济与全球化、国家与国际

体制管理、未来冲突等多方面。在新世纪国际预测的话题之下,我特别愿意强调的是这样几方面的新因素:其一,非传统安全研究所需要的学科门类,比如,气候变化、北极开发、海洋利用、太空合作、反恐问题等等;其二,人文知识对于国际预测的作用。如果说,带有计算性质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知识等等有利于对于状态与结构作出判断,那么,历史学、哲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知识则洞察的是人们的心灵,同样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长时段的社会演进。因而,对于人文知识的储备不可偏废。近30年来,作为国际预测研究中一个重要知识门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断走向丰富与成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多学科与多种思潮汇合趋势的体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分离,可以是英、法等列强称霸天下的有效支撑。到了20世纪之后,特别是大萧条以后,政府的政治干预已经成为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与经济的交织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冷战结束以后,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态变化更是反映出当今世界任何经济变迁已经与政治须臾不可分离。所以,当罗伯特·吉尔平总结道:世界经济的稳定有赖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合作之时,应该认为这样的判断是相当经典的。而最近几年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社会向度的内容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从新世纪以来若干国际预测作品的研究手段来看,许多专业的预测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一般而言的国际预测研究包含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外推式研究,也即依据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发生趋势的相互关联性,将最近时段的结构与趋势性变化按照时间序列作外推式延展,从而获得预测结果;第二,专家预测估计法,也即对于本专业领域的各方面专家进行全面的征询,在所取得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整理加工获取信息;第三,各种类型的模拟方法,其中包括逻辑形象模型、社会数学模型、因果模型、趋势模型、仿真模型等,在上述各种模拟的景象之下对与相关事物未来发展作出预判。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几个重大预测成果中都特别强调情景模拟方法的使用。比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作者们是采取了一种叫做“预景法”来捕捉未来国际社会可能的发展趋势。按照作者的介绍,这种方法与过去习惯于使用的“直线推测法”有着很大的区别。所谓的“直线推测法”是倾向于把注意力完全

集中在“预测”上,通过假定一个主线发展的情景,提供的只是一种关于未来发展的单维看法。而所谓的“预景法”则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潜在的,具有特别政策含义的各类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上。研究者需要找出关于未来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的主要趋势,然后,就影响这些发展趋势的内部因素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还要就这些可能的趋势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判断。比如,该项目作者提出了以下四种假想的情景,这些情景都不代表实际的预测,但是却描述了几种可以通过它们而进入的“预景世界”。作者强调的是未来事态的发展取决于这些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交织:其一,是“达沃斯情景”。这一情景表达的是未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将在中国和印度的推动下蓬蓬勃勃地发展,全球化将因之具有“非西方化的面貌”,全球政治规则也将随之而发生改变。其二,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这一趋势表达的是未来十五年美国在各个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仍将无可替代,并将在国际政治发生激烈变化的前提下帮助形成一个新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全球秩序。其三,是一个新的“哈里发”体制,这一体制强调的是:在可能发生的激进宗教认同感召之下形成的全球性运动将“能够对于西方价值体系进行挑战”。最后的一种“预景趋势”则是“一个发生周期性恐怖的世界”。作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因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所造成的不安定的世界。本项目的研究者们想要告诉读者,在今后的十五年中,这个世界将再也不会冷战时期那样比较确定的和鲜明的相互关系,而是充满着动荡和变化,因此,对于形势的预判就有必要通过排陈出多种态势的发展、变化、交织和互动来进行。运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预判形势,至少使得对于未来世界的看法不至于因为线性的思维方式而变得独断而僵化,也至少使得人们在构思未来时能够更多几种选择。

最后,观察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国际预测研究这一领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预测所赖以据的基本理论前提正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值得一提的犹如对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多元化”原则的重视,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以至于在奥巴马2009年11月首次访华之后的《中美政府联合公报》中,对于两国发展模式的互相尊重也前所未有地被列入条款。对于与此有关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相互关联性问题的研究,同样是在在各类国际预测中被广泛地应用和受到关

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普热沃斯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所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在中短期阶段中,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具有不确定的相互关联性的观点,显然已经在上述若干重要项目研究的专家队伍中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可以预见,这样的基础理论领域的偏好变化会对国际预测研究产生直接的影响。^[13]

总之,冷战以后、特别是新时期国际预测领域的这些新的情况表明了这一领域无论是工作理念、组织方式、还是研究手段都在出现深刻的变化。这样的一种变化表明国际研究领域的范式变革正在逐步形成。

三

国际预测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术和决策研究的知识门类实际上还是面临着大量的挑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预测本身的机理。虽然从事国际预测的专家都是从过去和未来的关联性角度在对事物作出判断,都相信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某种延续性。但是,卡尔·波普认为:“历史未来发展的方向从来是不可能被预测的”。^[14]迄今为止,还并没有看到国际预测领域的研究专家对这样的直接挑战做出非常正面的回应。记得在前苏联时期留学的时候,当时的苏联著名国际预测专家贝斯图谢夫-拉达在其专著中已经提到了那时的激烈争论,也即人们能否对于国际政治家的行为逻辑作出预见性的判断。反对方面的意见认为,如果人的行为能够被如此预测,那么,人与猴子还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从一个非专业预测工作者的立场出发,我觉得,虽然,提出一种近似的判断、或者提供一种框架性的指示国际行为者的活动范围与区间,多少还是有可能为国际发展的未来前景做出若干有价值的判断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建立,其基础显然还有待大大地加强。

从国际预测所涉及的基本理论方面来说,无疑,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国际预测的规范性前提和依据。上文说到,基本理论领域正在出现若干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当我们说到对于多样化发展趋势和多元化国际社会前景表示关注的同时,还必须

顾及到几十年来,对于“多样性”和“进步性”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理论上也还是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曾经做出过巨大努力,但他而后对此也依然表示尚不能令人满意。又比如,前文提到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尽管,通过实证研究在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样的一种研究也还并没有从理论逻辑上进行详尽的论证。这样一种状况,肯定还会影响到相关国际预测的有效性。我也记得,2007年年初,当《普林斯顿报告》的专家代表团来到上海听取意见的时候,同行的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在午宴时在一旁对我感叹地说道:“目前的这些预测报告很有水平,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有力支撑”。恐怕这也是西方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对于目前带有前瞻性分析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及其理论背景所说出一句真话。

近几十年来,国际政治中由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而向建构主义思潮的转换,我觉得是由一个出现在其前后的认知范式的革命性变迁所支撑的。认知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更替,东方与西方在多年对立之后从属关系的开始被逆转,一种体现人类本身生存价值的主张平等对话的潮流的风起云涌,使得人们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以及未来趋势的认知,既觉得无比兴奋而寄予希望,但又是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事实上,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复杂局面,人们对于未来国际社会走向的认知兴趣丝毫不见衰减。

也许,这就是对于国际预测研究的工作既不应过于乐观、也不需过于悲观,而需要扎扎实实地学习和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在吧。

在此华东师大出版社所组织的“大国预测丛书”出版之际,应约作序,既是多时以来在组织丛书过程中阅读思考以及和朋友们交流之后有所体认的一个记录。同时,对于这套丛书在出版社和海内外同仁们合作努力下所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对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985国家基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等各方的合力支持表示感谢。

[1]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99 summer, pp. 109 - 140.
- [2] Nathan Gardels 对于 Francis Fukuyama 的采访,载于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9 年 10 月 20 日。
 - [3]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2007 年 11 月 3 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张建琴翻译;朱杰等整理。
 - [4] Henry Kissinger: “*The Global Order in Flux*”, *Washington Post*, 9 July 2004.
 - [5]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蒋国鹏、隗静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对话。
 - [6]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99 summer, pp. 109 - 140.
 - [7] 米尔斯海默于 2002 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所作的讲演。
 - [8] 罗伯特·卡根:“历史的轮回”载于《*New Republican*》2008 年 4 月。
 - [9] 约翰·艾肯伯利,“中国崛起与西方的未来”《*Diplomacy*》2008 年,第 1—2 期。
 - [10]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 1 月版,447—450 页。
 - [11] 保罗·肯尼迪,引自 2009 年 1 月 18 日新华网:美国世界论坛网 1 月 15 日文章,题为: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
 - [12]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大趋势——2020 年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相蓝欣译,2007 年 4 月。
 - [13] (美)普沃斯基:见序言,《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14]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99 summer, pp. 109 - 140.